



岭外別傳

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

李舜臣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岭外别传

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

李舜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 / 李舜臣著. —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491-1615-7

I. ①岭… II. ①李… III. ①僧侶—诗词研究—广东—清代
IV. ①I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7398 号

LINGWAI BIECHUAN

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

著 者：李舜臣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出 版 人：周洪威

出版统筹：谭庭浩

责任编辑：阮清钰

封面设计：肖晓文

责任技编：王 兰

责任校对：王 燕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4mm 1/16

印 张：25.25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黄天骥

去年年中，李舜臣教授的著作《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完稿，嘱我作序。今年元旦，舜臣和欧阳江琳伉俪来舍，带来了他们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含章，又告诉我书稿已经成书。我迫不及待，立刻请出版社给我送来样稿。我素来饶舌，接连看到舜臣的两个“宝贝”，喜不自禁，说话更是滔滔不绝，连老伴也批评我像吃了兴奋剂。

第二天，翻阅舜臣的样书，十多年前他和江琳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初，我曾想让他跟江琳一起研究古代戏曲，但考虑到他沉实内向的性格，学习戏曲艺术，未必合适。正踌躇间，忽然接到春风文艺出版社来函，约我主编《元散曲三百首》，我让舜臣等几位博士生也参加了。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舜臣文笔流畅秀丽，对诗歌的分析，也细腻深入，便建议他以研究古代诗词为主攻方向。

不过，让舜臣选取什么样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颇费踌躇。记得舜臣也颇为焦虑苦恼。根据他的业务基础、性格，以及学术领域发展的情况，我和他在一起时，常会讨论选题的问题。其实，让舜臣从哪方面进行研究，我心中还是多少有数的。当时，学术界已经比较注意学科交叉的研究，例如对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我自己，一方面在研究古代戏曲形态问题，一方面在考察戏曲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久也写出了《〈长生殿〉艺术构思的道教内涵》的论文。正在这时候，岳麓书社给我寄来了八指头陀的诗集；以大汕和尚为太祖师的澳门普济禅院，恰好也邀我前往撰写碑文。种种机缘，有关文学创作和宗教信仰的问题，让我经常萦回于脑际。有一个时候，甚至想动手研究涉佛的诗作。但是，我从工作需要，早已确定了以“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目标，并且也知道这一论题的深浅，实在不敢旁骛。以我对舜臣性情养素和业务基础的了解，几经斟酌，我便想，未尝不可以引导他以诗歌创作与佛教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不过，若让他泛泛而谈，毕业论文会写得大而无当，游谈无根。比较合适的做法，

是从具体问题入手，观察诗人的宗教信仰与其创作之间的联系。而最能体现二者的关系的，则是历代文坛往往出现的颇为独特的群体——诗僧。

我从来有和青年教师或研究生在晚饭后散步的习惯。黄昏时分，康乐园微月初升，晚风迎袖，二三子分花拂柳，且行且聊，自得其乐。我们时而海阔天空地胡扯，时而交流学习的心得。一天，我约舜臣陪我散步，自然也谈到毕业论文的选题。我清楚地记得，当走到大钟楼附近，晚钟响处，我停住脚步，向舜臣提出建议：研究“诗僧”。我的想法是，既可以研究历代的诗僧，写一部“诗僧史”；也可以在了解我国诗歌创作与宗教关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某一时代的诗僧群体，或者专门研究某一位诗僧的创作特色。当时，舜臣似乎眼前一亮。过了几天，他告诉我，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决心以诗僧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论题。

选题确定后，舜臣倒很少和我接触。我有点奇怪，也生怕他啃不下这块硬骨头。后来从旁了解，原来他一头钻入图书馆，夜以继日地苦读。本来，舜臣身体不算健壮，经过一段时间，发觉他竟瘦了一圈。我深知研究这论题的困难，除了提醒他注意休息外，也只好让他先当上一阵“苦行僧”。等到舜臣把写好的部分章节，送交给我审阅，细读之下，大喜过望。我相信他的论文，一定会写得很成功。果然，几个月后，经过毕业答辩，舜臣的论文，被答辩委员们一致评为“优秀”。

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具体作品形象以及对作者经历、性格的细致分析；在这基础上，概括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及地域特色，阐述并归纳诗僧这一创作群体的面貌，是舜臣的毕业论文受到专家们赞扬的重要原因。据知，他在来到中大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比较注重文学理论的学习。这本来是好事，但也不免受到当时文坛流行的先定“理论框架”“以论带史”之类风习的影响。在中大求学的几年中，在康乐园学风的熏陶下，舜臣彻底改变了以往空疏的习气，开始注重见微知著求实创新的学习方法，并且得到长足的进步。而本来从理论学习练就的逻辑思维能力，一旦改变了被扭曲的状态，把先定“框框”再举例求证的做法颠倒过来；从具体事例作进一步的宏观归纳，这一来，具备了较好逻辑思维能力的舜臣，也更能条分缕析，有条不紊把复杂的问题，论述得简明扼要，精练流畅。传闻在他毕业后北上求职时，某地学府原本准备接纳他，给他和江琳安排了教职，但条件是，要他改变在康乐园获得的研究方法。据说舜臣当即拒绝，放弃了该校的聘请。对此，我

没有向舜臣当面求证，但按我对他倔强沉实性格的理解，以及从他发表的论著中，看到他一直坚持的严谨平实的学风，我相信这是真事。

在中大毕业以后，舜臣围绕着诗僧的问题，锲而不舍地研究，而且越钻越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也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虽说是在十多年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但经过整饬，又有明显的提高，这正是由于舜臣在毕业后坚持不懈，在诗僧研究方面不断有所创获的结果。作为师友，我为舜臣取得优异的成就，能成为研究诗僧领域的专门家，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很佩服这位年轻学者顽强攻坚的学习精神。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想当年，我对舜臣研究诗僧的论题，曾经有所建议，而现在，我从舜臣的论著中，也获得了许多教益。从这一点上，我深深地感受到学无前后、达者为师的真谛，体会到教学相长的乐趣。

近百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学史、宗教史和文化史上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对诗僧特别是对诗僧群体的研究，实在还处于起步的阶段。现在，舜臣选取清初岭南诗僧群作深入的研究，详尽地论述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独特创作群体，这对掌握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状况，很有帮助。记得康保成教授曾建议舜臣通读《大藏经》，我想，即使不能一下子读完，也应是舜臣努力的方向。如果在这基础上观察清初岭南的诗僧，从整个宗教史发展的维度给予判断，特别是注意到大乘佛教对汉民族思维模式的浸润，注意到惠能禅宗一派之所以会产生在岭南，以及它对明清社会和岭南人士的深远影响，这将能更全面推进这一独特论题的发展。

一别多年，我马齿徒增，渐成老朽。而舜臣伉俪，尚容颜如昨。看到这小两口学有所成，家庭幸福美满，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舜臣勤奋明慧，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在诗僧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一定能够坚持把在康乐园获得的良好学风，驰骋于学坛，扎根于江右，在教学科研上取得更大的贡献。

写于2017年春节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目 录

绪 论 / 1

- 一、问题的提出 / 3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5
- 三、前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11

第一章 清初岭南诗僧群崛起的政治文化背景 / 21

- 第一节 “应劫而生”的诗僧群 / 23
- 第二节 明中后期“儒释会同”的学术背景与士人禅悦之风 / 33
- 第三节 丰厚的禅文化土壤 / 40
- 第四节 诗文化的蓬勃 / 47

第二章 群体之构成与生活形态 / 55

- 第一节 群体规模的基本估价 / 57
- 第二节 以宗门世系为纽带的群体组织形态 / 69
- 第三节 充满着法缘与俗缘纠葛的生活形态 / 79

第三章 清初岭南诗僧的结社活动 / 99

- 第一节 “莲社”的传统 / 101
- 第二节 清初岭南诗僧结社活动考述 / 105
- 第三节 清初岭南诗僧结社的文化意义 / 126

第四章 清初岭南诗僧的诗心 / 133

- 第一节 苦难的悲吟 / 135
- 第二节 故国的挽歌 / 141
- 第三节 尘劳的解脱与禅悦之风致 / 148
- 第四节 友谊之求与媚俗之态 / 157

第五章	诗学旨趣与诗歌风貌 / 169
第一节	僧诗的特质：“蔬笋气”与“酸馅气” / 171
第二节	清初岭南诗僧的诗学取向 / 183
第三节	诗歌风貌 / 196
第六章	论金堡澹归——清初岭南诗僧个案研究之一 219
第一节	从南明净臣到岭南高僧 / 221
第二节	金堡澹归的文 / 227
第三节	澹归的诗 / 233
第四节	澹归的词 / 239
第五节	关于金堡澹归的历史评价 / 249
第七章	论石濂大汕——清初岭南诗僧个案研究之二 255
第一节	毁誉参半的石濂大汕 / 257
第二节	《离六堂自叙》所蕴含的诗学思想 / 266
第三节	大汕的诗品 / 271
第四节	石濂大汕所透显的文化意义 / 287
结语	/ 293
附录	/ 299
附录一	海幢阿字今无禅师年谱 / 299
附录二	长寿石濂大汕禅师年谱 / 327
附录三	王夫之与金堡澹归关系考论 / 354
附录四	冼玉清先生未见两种清初岭南诗僧诗集叙录 / 363
参考文献	/ 367
后记	/ 378

高
麗
印

緒
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一、问题的提出

明清之际，时人多称为“天崩地坼之日”^[1]。长年的战乱以及“夷夏鼎革”对世人身心造成的创伤堪为史上仅见，很多人不得不遁入山林、寺院，安顿流离颠沛的身心。邵廷采云：“至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2]邵氏指出了明季劫后余生的士大夫的两难选择：非出仕即逃禅。此种说法容或绝对，但观当时的文化大势，遗民出家逃禅风潮确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3]的岭南地区，此风尤盛。大批文士披上袈裟，在山林丘壑间、古佛青灯旁，歌咏吟啸，长歌当哭，由诗人一变为诗僧。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诗僧群崛起于清初岭南诗坛。关于此诗群的概貌，清中叶的岭南文士何桂林有如下之描述：

吾粤方外士以诗鸣者，俱本正声，所以古今传诵不绝。大率明季甲申、丙戌之遗老而逃于禅者多，如憨山之有《梦游集》，空隐之有《芥庵集》，正甫之有《零丁山人集》，天然之有《瞎堂集》，祖心之有《千山集》，阿字之有《光宣台集》，石鉴之有《直林堂集》，珂衍之有《鹤鸣集》，真源之有《湛堂集》，仞千之有《西台集》，乐说之有《长庆集》，澹归之有《遍行堂集》。自天然之开法岭南，所采阿字辈一百二十余人之集编而为《海云禅藻》，大启宗风。其诗类多感时述事，亦如憨山之一派皆出乎性情之正，所以历久而弥彰。百余年来，尘异、石洞、迹删诸宿著作如林，为《咸陟堂集》；又数十年，则有静公之《香海集》，隐公之有《竺堂集》，澄公之有《水云

[1] 顾炎武《先妣王硕人行状》云：“若不孝者，何以安吾母？而犹然有觊于斯人之中，将于天崩地坼之日，而卜葬桥山之未成，而马鬣之先封也。”顾炎武撰，华忱之校点：《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6页。

[2] 邵廷采著，祝鸿杰校点：《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3] 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自序》，《清代人物传记丛刊》第70册，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集》，戒公之有《玄庵集》，涉公之有《片云集》，悉以海云为宗，海幢为派，由源溯流焉。^[1]

所谓“海云”“海幢”是指清初岭南曹洞宗第三十四代高僧天然函呈及其门徒阿字今无在广州开创的名刹，在他们的周围聚集着大批能诗的僧人，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信仰、相近的生活境遇，彼此间甚至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法缘，在诗歌创作上显示出大体相近的情感倾向与风格特征，故历来有“海云诗派”或“海幢诗派”之称。^[2]须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尘异、石洞、迹删等人，非属海云、海幢寺僧。且除以上诸僧外，还有大汕、愿光、达津等一批与海云、海幢关系不甚密切的诗僧。若仅以“海幢诗派”或“海云诗派”来概述整个清初岭南诗僧，并不甚恰当。因此，我们选择了在内涵与外延上较“流派”均更为宽泛的“群体”来名之。

覃召文先生在《岭南禅文化》一书中指出：“清初岭南崛起的诗僧集团是一个庞大的诗群，也许，这还是中国至今以来最大的诗僧集团。”^[3]笔者搜集了一些文献，考得此诗群人数约有154名，较《全唐诗》所录诗僧还多出近40人。^[4]因此，称其为“中国至今以来最大的诗僧集团”，是没有问题的。

群体人数的多寡并非意味着研究意义之重大，而真正需要参究的是这个群体的创作实绩、影响以及所凸现的文化意义。诚然，若仅从文学鉴赏与文学价值评判角度出发，与其选择这一并非为人们所熟知的诗群作为研究对象，倒不如立足于那些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更具意义。就岭南诗歌而言，著名的“岭南三大家”显然更具有代表性。然而文学研究有时又并非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其意义更多的是与他种文化之综合。作为横跨宗教与文学两个领域的诗僧现象，无疑具有突出的研究意义。

清初岭南诗僧群不仅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创作实绩，而且还是一个特征十分鲜明的诗群。其中的多数成员，决非传统意义上的僧人，他们甚至以枯禅

[1] 何桂林：《莲西诗存序》，见释宝筏《莲西诗存》卷首，光绪十九年刻本。

[2] 除何氏“海云为宗”“海幢为派”云云，民国屈向邦《广东诗话》卷三亦有相似提法，陈永正先生主编《岭南文学史》则以“海云诗派”指称天然系诗僧。

[3] 覃召文：《岭南禅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4] 请详参本书第二章。

衲子为非，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例如，有曾为“永历虎牙”、出家后反为尚可喜歌功颂德的今释澹归；有通海经商、蓄养优伶，但所创作的诗歌却有着强烈悯乱伤时情怀的石濂大汕；有多被学者称为“清初第一文字狱”的主角剩人函可；有清初岭南佛门领袖天然函呈；复有被沈德潜称为“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1]的迹删成鹫……他们充满法缘与俗缘纠葛的生活形态和复杂多面的人格，很能折射出明清鼎革对时人造成的影响。显然，对于这批诗僧及其诗作的解读，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它对清初岭南的社会状况、文化风尚特别是禅文化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在本文开始前，有必要对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略作界定，以明晰我们的研究范围。

（一）诗僧

诗僧，是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他们以灵心慧笔，创作出大量风格独特的诗作，成为华夏诗坛禅苑中的一朵奇葩。可是，什么样的诗人才能称为诗僧呢？有人说，诗僧，不就是会写诗的和尚吗？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游移于僧俗两界者着实不少，有半路出家的；有中途还俗的；还有虽剃了头，骨子里却与俗人无异的。清人魏禧言：“夫僧有始于真、终于伪，有以伪始以真终，又或始终皆伪，愈不失其真者。”^[2]因此，人们在界定“诗僧”这一概念时，常出现不同的意见。

据笔者所知，目前学界对“诗僧”的界定，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6页。

[2] 魏禧撰，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外编卷十《赠顿修上人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9页。

其一认为，“诗僧可以说是以写诗为‘专业’的僧人，也可以说是披着袈裟的诗人。他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1]其二认为，“凡是信仰佛教的诗人”都可称作诗僧，既包括出家的僧人，也不排除在家修行的居士诗人。^[2]这两种说法，分别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似乎都有道理。但仔细思量，又不甚周全。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指出了诗僧的特长是写诗，但对僧人身份的界定尚不明确；第二种说法，从大乘佛教的精神出发，似乎更贴近中国佛教发展的实际，但将居士诗人也纳入诗僧这一群体，则又过于宽泛，反而模糊了诗僧的“本来面目”。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古人亦颇多疑义。《四库全书总目》就多次批评前人在界定诗僧身份时的一些不妥做法。如评明释正勉、性涵所编《古今禅藻集》云：

中间如宋之惠休、唐之无本，后皆冠巾仕宦，与宋之道潜老而遭祸、官勒归俗者不同。一概收之，未免泛滥。^[3]

“宋之惠休”，据《宋书·徐湛之传》，他本姓汤，早先入沙门，然刘宋孝武帝命其还俗，官扬州从事史。^[4]“唐之无本”，即中唐著名诗人贾岛，早年亦出家，法名无本；后来在韩愈的劝说下返俗，官长江主簿。从这两人的经历看，他们皆是因尘俗诱惑，而自愿弃佛归儒的。道潜，即与苏轼关系密切的参寥子，及苏轼谪迁岭南，他亦坐罪，被官府勒令还俗，后勒令解除，复祝发为僧。虽同为半途还俗，然道潜非出于本心，与惠休、贾岛二人实有本质之别。故馆臣认为，惠休、贾岛不应与道潜一样，被收录在僧诗选本中。此外，在评南宋李龏所辑《唐僧宏秀集》与《唐四僧诗》时，馆臣又重申了这个问题。可见，他们是持较为严格的标准来界定诗僧的，将那些虽曾出家但后来又自愿“返初服”“复冠巾”的诗人，排除在诗僧之列。而对于所收诗僧别集的作者，则一般从释家习惯，皆明确冠以“释”或“僧”之姓。

[1] 孙昌武：《佛教与唐代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2] 仪平策：《中国诗僧现象的文化解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4页。

[4] 沈约：《宋书》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47页。

从诗僧发展史看，四库馆臣在鉴别诗僧的身份时所持的审慎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释子作诗，始于六朝。^[1]东晋有“援笔染翰，以慰二三之情”^[2]的支遁，复有在庐山集僧人、居士吟咏唱和的慧远，稍后又有帛道猷、宝月、宝志等人，皆为僧人作诗的较早代表。《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共辑录六朝诗僧42人，诗作246首。不过，综观六朝僧诗，大抵偈颂气浓，诗味寡淡，创作数量并不可观。故六朝僧诗虽有一定的影响，但作为一个特殊的诗人阶层尚未形成气候，当时的文献亦未有以“诗僧”来指称这些释家诗人的。

“诗僧”一词的发明权，似应归于中唐诗僧皎然，其《杼山集》有两处出现“诗僧”一词。一处在卷四诗题《酬别襄阳诗僧绍微》中；二处在卷九《答权从事德舆书》中：“灵澈上人足下，素识其文章……自齐梁已（以）来，诗僧未见其偶。”^[3]与皎然约略同时的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中亦云：

“……乃抵吴兴与长老诗僧皎然游……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譬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园新寺》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犬寄家书。’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独雄于诗僧间邪？”^[4]“诗僧”一词在此文三见，足见梦得已有较明确的“诗僧”观念。这几则材料里所提到的诗僧，像皎然、灵澈、护国、清江、法振，都是当时善于作诗的僧人代表，既无半途还俗之经历，更不同于一般士大夫诗人，而是以诗为名的出家僧人。这与四库馆臣的观念，就颇为接近了。

不过，馆臣在批评别人时，同样也有不少疏略。且不说他们误将晚唐诗僧清塞为周朴，^[5]在界定宋代江西诗派诗人饶节的身份时，亦前后抵牾。饶节，本江西诗人，晚而为僧，更名如璧，《四库全书》录其《倚松老人集》二卷。馆臣认定集中之诗大半为僧后所作，但为该集署名时，仍是“宋饶节撰”，而非“释如璧撰”。然而，在《古今禅藻集》提要中却说：“宋倚松老人饶节，后为僧，名如璧，陆游《老学庵笔记》称为‘南渡诗僧之冠’，与

[1] 王夫之《姜斋诗话》云：“衲子诗源自东晋来。”

[2] 支遁：《八关斋诗三首（并序）》，见艾若、林凡、郁贤皓主编：《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 皎然：《杼山集》卷九《答权从事德舆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860页。

[4] 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7册，第444页。

[5] 关于此，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已力辨之，此不赘述。

葛天民卒返初服者亦不同，乃漏而不载。”^[1]这显然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余嘉锡先生有一个提法，笔者以为很值得重视。他在《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中说：“……（周）贺平生所作诗，多作于为僧之时，其集之行世者，又或直题清塞之名，未及一一追改，故选僧诗者得而录之。若贾岛官至长江簿，以官名集，其诗又皆作贾岛，无追题其无本之名者，故不得而阑入之，是亦《春秋》名从主人之义也。昔梁刘勰出家，改名慧地；宋饶节为僧，改名如璧；而《南史》勰本传及吕居仁《江西宗派图》皆仍用其本名，以其著述成名，在未为僧之前故也。周贺少而出家，老始还俗，为僧之日长而为士人之日短；故《诗人文客图》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皆直名之曰僧清塞，李廙列入唐僧之中，初非漫然无所据者，不可谓之自乱其例也。”^[2]这里，余先生以“《春秋》名从主人之义”及为僧时日之长短，来定夺其是否为“诗僧”，显得更为灵活、通脱。

像贾岛、刘勰、饶节等这样很难称为诗僧的诗人，历史上还有不少，特别是在遗民逃禅成风的明末清初。像被称为“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顺治七年（1650年）尚可喜广州屠城后，即避难剃发出家，更名为今种，字灵一，“自首至足，遂无一而不僧”。^[3]可不久，他即浪迹岭外，四处拜访前朝遗老，凭吊故迹；回到岭南后，复弃佛归儒，甚至以儒者自尊，猛烈“辟佛”。这表明，貌似缁流、实为遗民的屈大均，是绝不愿意人们将他视为诗僧的，至于钱谦益为他所作诗序里，称其为“诗僧”，那是他仍避难佛门之时。在清初岭南，像屈大均那样徘徊于僧俗两界的诗人还有不少，如黎遂球、梁朝钟、王蒲依等人均曾削发出家，然又因种种原因皆还归俗界。对他们来说，佛门只不过是人生暂时的避难所而已，其终极追求不是成佛作祖，而仍是忠君事功的儒家理想，故实难以“诗僧”冠之。

此外，还有一个与诗僧关系密切的问题须加讨论，那就是诗与偈的关系。有的人认为，诗偈等同，像拾得有诗云：“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

[1]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第1724页。

[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77页。

[3] 屈大均《翁山佚文辑》卷二《髻人说》中谓：“庚寅年二十一，又复髻，则予圆顶而为僧，然犹不肯僧其帽，终岁戴一青纱幅巾。壬辰二十三岁，为飘然远游之举。以城市不可以幅巾出入，于是自首至足，遂无一而不僧。”